

大变局下的民生

近代中国再认识

戴鞍钢著

近

代

中

国

研

究

书

系



上海人民出版社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戴鞍钢 著

大变局下的民生

近代中国再认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变局下的民生:近代中国再认识/戴鞍钢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ISBN 978-7-208-10834-9

I. ①大… II. ①戴… III. ①社会生活-研究-中国-近代 IV. ①D69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41467 号

责任编辑 毛志辉

封面设计 范昊如

·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 ·

大变局下的民生

——近代中国再认识

戴鞍钢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635×965 1/16 印张 22 插页 2 字数 311,000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10834-9/K·1904

定价 42.00 元

总 序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汇集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部分教师的成果,是以主题的形式辑录各教师所发表的专题论文。

历史学系是复旦大学最为悠久的系科之一,1905年复旦公学高等正斋创设伊始,就在文科中开设有历史学几门课程。1925年正式设系,时称史学系。经过1952年的院系调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得到江浙多所大学著名史学家加盟,实力大为增强。在中国史方面,有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马长寿、蔡尚思、杨宽等教授;在世界史方面,有周谷城、王造时、耿淡如、陈仁炳、章巽、田汝康等教授。前辈学者常常言及,那时的历史学系,与中文系一起共同构成复旦文科的“两个超级大国”。此后,历经几代学者的努力开拓和辛勤耕耘,历史学系形成了鲜明的研究特色,并且始终占据复旦文科发展的最前列,用周予同先生的话来说,历史学系的发展就是要“为复旦争取学术地位”。

这其中,中国近代史学科建设尽管起步稍晚,也得到很好的发展。中国近代史最初只是“中国史”的一部分,1954年中国史划分为中国上古史(主任胡厚宣)、中国中古史(主任谭其骧)、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主任陈守实),至此中国近代史算是在建制上初步成型。1958年中国史方面的上古史、中古史教研室合并为一(主任陈守实),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则发展为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室(主任胡绳武)。到20世纪70年代,又形成包括中国近代史教研室、中国现代史教研室和中

大变局下的民生
—

国思想文化史研究室的建制,这些都显示中国近代史学科不断发展壮大的情形。正是通过蔡尚思、胡绳武、金冲及、汪熙、陈绛、陈匡时、黄美真、余子道、沈渭滨、黄苇、杨立强、朱维铮、李华兴、姜义华、刘其奎、赵少荃等学者的努力,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海内外学术界所瞩目,尤其是在思想文化史、中外关系史、汪伪政权史、资产阶级史等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集体编撰的成果即包括有《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研究》、《现代中国思想史资料简编》、《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辛亥以来人物传记资料索引》等。1994年,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成为“国家文科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基地”;1996年建立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1998年成为国内首批五家获得历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的单位之一。这些皆为体现复旦历史学科整体研究实力的标志,内中也包含中国近代史学科的贡献。

步入21世纪,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又有长足发展。以该学科为主体成立的“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姜义华任主任,吴景平、章清任副主任),2004年列入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2007年,中国近代史学科还被列入“国家重点学科”。此外,本学科承担了国家及省部级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多部有影响的学术著作问世,并在《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重要刊物发表数十篇专题研究论文,还编辑出版了《近代中国研究集刊》和《近代中国研究专刊》。本学科每年都主办两次以上的国际学术研讨会,这些学术活动,使本学科始终站在学术前沿,在海内外的学术影响也进一步扩大。

“近代中国研究书系”选录的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为主的部分教师公开发表的有代表性的著述。这些著述,大都出于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虽由于作者的年龄、阅历、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各有不同而各具特色,但都是这些教师在教学科研中开拓挖掘的成果,是多年心血的积累,反映了这些教师的研究足迹和心路历程,也是复旦大学历史学系风貌的一角。通过这些著述,可以把握各个历史时期各个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而且可以以动态的、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审视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中国近代史学科的和现在,进而为将来的学科建设奠定更加坚实的基础。需要说明的是,由于是以专题论文的

形式组织书系的出版,因此,还有不少教师的论著未能收入其中,有的教师此前已有集辑出版;暂时还没有这样考虑的,则只有留待他日了。

“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尊重历史,尊重此前各个历史时期各个领域的学术成果,从历史史实和“历史性”的成果中吸取养分,是“创造”未来学术前沿的前提,也是学术发展永恒的宗旨和道理。我们出版这套书系,在借以回顾和总结以往的成绩及不足之时,同时向学界和社会寻求批评,寻求来自更多层面的交流和沟通,以期共同推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

在“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组稿及编辑过程中,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人员付出了不少努力,在此表示真诚的谢意!

是为序。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近代中国研究书系”编委会

2012年3月

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戴鞍钢教授访谈

(代前言)

谢宝耿(以下简称谢):戴教授,我在寻觅优秀中青年专家访谈对象的过程中,学术界不少知名人士不约而同地提到您,可见您的学术成果已被公众首肯。按照惯例,是否先谈谈您的治学道路?

戴鞍钢(以下简称戴):好的。我是“文革”结束后,作为首届考生进入复旦大学求学的。此前,我中学毕业后就去上海郊区插队务农。经历了十年浩劫,我和我的同学都格外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记得当时校图书馆座位有限,每当课后我都早早去排队,用“争分夺秒”、“如饥似渴”去形容当时我们的学习热情,一点也不过分。正是在这样浓郁的学习氛围中,我逐渐步入史学研究这座既深奥又富有魅力的学术殿堂。本科毕业时,我决定继续求学,师从黄苇教授研习中国近代经济史。选择这个研究方向,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长期以来受各种因素的制约,中国近代史研究基本上局限于政治史,经济史的研究明显薄弱,直接妨碍了这门学科的发展。1981年刘大年先生撰文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突破口,应该是最薄弱、最繁难而又最重要的经济史研究。作为有志于这门学科的后来者,我觉得经济史的研究是我大学本科历史学的视野的拓展,虽有一定难度,但应该迎难而上。另一方面,我也受到现实生活的感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同心协力地投入现代化建设的伟大事业,我深切地感到,史

大变局下的民生——

学研究应该也可以为当代社会的发展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借鉴和启示。正是因为考虑成熟,目标明确,多年来,不管外部环境怎样变化,我始终认准方向,潜心钻研,不断进步。

谢:从史学大师刘大年的字里行间发掘中国近代史的薄弱环节,即加强经济史的研究,力图作为拓展历史学视野的突破口,说明您很敏锐。那么,您是怎样入手研究的?

戴:经济史研究内容广泛,涉及农业、工业、手工业、外贸、商业、财政金融、交通运输等方面,其中我特别注重对基层社会经济状况的考察,我的硕士学位论文《清代后期漕运初探》是一次很好的尝试。以往研究漕运,大多侧重制度本身,较少论及制度实际运作过程及其社会影响。我的研究,则在厘清制度规章条文的同时,着力揭示作为“一代之大政”,清代漕运在其实施过程中所出现的许多问题,诸如因此滋生的弊端、腐败和引发的社会矛盾,以及漕运变革对社会生活的多方面影响,包括近代航运业的启动,运河沿线商业活动的凋敝,大批人口失业和大运河淤塞等。这些见解先后刊登在《清史研究集》、《齐鲁学刊》、《江汉论坛》、《东岳论丛》等杂志上,受到好评,也坚定了我的学术追求。

谢:我感到学术界所以对您的研究有好评,主要是您的研究视角很独到,此前几乎无人涉足。那么在這些内容中,您的研究重点在哪里?

戴:我的研究重点是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的互动。关于近代中国城市和农村经济,近年来分别已有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也有一些译著出版。综览这些论著,其研究重点或是城市,或是乡村,而将两者有机结合起来,深入剖析其内在互动关系的专题研究尚不多见。这种状况,有碍对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演变历史进程的全面认识。我认为,尽管从总体上说,近代中国的广大农村仍处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束缚之下,经济发展迟滞,社会变动缓慢,但是鸦片战争后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封建的社会经济结构逐步分解,沿海沿江一批通商口岸城市相继增辟,以这些城市为中心,近代企业陆续兴办,轮船和铁路先后运行,市场贸易和商业资本不断发展,新式金融业次第开张,这些都给中国农村

以耕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带来猛烈冲击,相当一部分受到通商口岸城市经济直接或间接辐射的农村经济开始发生了深刻变化,主要表现为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经济的发展,这种演变同时也支撑和推动了近代中国城市经济的变革。应该说,这种双向的互动关系符合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历史要求,是积极的。深入地研究这段历史,有助于全面认识近代中国经济发展演变的历程。

谢:把研究重点放在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的互动方面,很有价值。我看过不少论著,对城市和乡村的研究,非此即彼,而将两者结合起来研究、探索它们之间的互动,则很少,也很不容易,恐怕需要发掘大量资料才能着手。据我所知,这方面的资料很少很散,您是怎样开展这项工作的?

戴:您说得对,研究城乡经济的互动确实需要花大力气,发掘大量资料。史学研究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尽可能详尽地掌握相关资料。但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易事。近代中国城乡经济互动关系的研究长期很少有人涉足,原因之一,能够具体反映近代中国城市特别是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城市与农村间的经济互动关系的资料极为散见,不易爬梳。有鉴于此,十余年前,我就甘愿坐冷板凳,潜心收集相关资料,特别是着力从卷帙浩繁的地方志中探寻原始的乡土资料。地方志是中华民族文化宝库的重要部分,它内容丰富,包罗万象,蕴藏着大量自然和社会方面的各类资料,人称“一方全史”,为真切了解国情、乡情、民情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历代地方志散布各处,数量庞大,系统挖掘和整理其中的经济资料,非一日之功,以致许多珍贵资料一直湮没不彰,而这些资料对研究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演变极有价值。特别是到了近代,由于社会结构变动剧烈,各地经济交往包括城乡交流日趋扩大和频繁,地方志中记述经济演变的资料明显增多,以往人们虽知道地方志的独特价值,但面对汗牛充栋的古旧地方志,常常望而却步。我则知难而进,与黄苇先生一起组织同行,历时数年,走访各地,从数千种地方志中精心辑录、编纂了一部275万字的《中国地方志经济资料汇编》。

谢:我知道,做资料工作很辛苦,而且一旦有了新发现,大多不乐意拿出来供公众使用,以便自己慢慢地在论文和书著中享用。您是怎

大变局下的民生——

样对待此问题呢？

戴：虽说现在肯做原始资料爬梳整理工作的人并不多，也不太愿意将自己辛辛苦苦收集的资料供大家利用，但为了学术的繁荣，我除了精心主持资料的编纂，还自筹资金补贴出版费用的缺口，终于使这部资料集在延搁十年后得以问世，因为我觉得，为推动学术的发展，做一些扎扎实实的工作，是我们这一代中青年学者应该担负起的责任。这部资料集因其编选精审，并涵盖农副业、手工业、近代工矿业、商业、外贸、交通运输、邮政电讯、货币金融和社会经济生活等各个门类，甫经出版，立刻得到学术界的瞩目和上海《文汇报》的推介，海内外学者纷纷直接向我求购，我为我们的辛劳得到社会的认可感到欣慰。

谢：有了扎实的资料基础，对深入研究就像造房子那样，有了可靠的地基，难怪此后“万丈高楼平地起”，学术成果像雨后春笋那样频频问世。您在这方面具体有哪些项目，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如何？

戴：20世纪初年，中国大地上相继出现一批采取集股商办形式开办的新式农垦企业。它们的设立，直接受到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推动，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在近代中国农村的渗透和延伸。我依据翔实的资料，指出这是中国农业发展史上的重要一页，由于这些新式农垦企业的设立，在一些地区引进了欧美资本主义农场的经营方式，应用了农业机械，传播了先进技术，促进了商品化农业生产。尽管近代中国的社会环境严重阻碍了这些企业的发展，但其积极意义不应忽略。我的这项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1949年以后首次详尽探讨新式农垦企业的成果，主要论点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编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目录提要》详细摘录介绍，美国学者王国斌新著《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也予征引。继而，我又发表了《近代上海与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变迁》，认为近代上海开埠后，成为中国对外贸易大港和工商业、金融中心城市，毗邻的苏南浙北农村经济受此促动，发生结构性的深刻变化。上海的内外贸易和城市经济，推动了苏南浙北农副业的发展，促使棉花、蚕桑、蔬菜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明显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提高，并相应形成几个生产相对集中的产区；与此同时，原先面向国内市场以丝、棉织造为主的农村传统手工业的生

产、经营发生剧烈变动,呈现转向国际市场、附丽于进出口贸易的新趋向。这些变化反映了传统农业向近代农业转型的历史进程,体现了近代都市和周边农村互动的双向经济关系。这些见解得到学术界的重视,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前沿报告(1998)》认为,区域研究仍是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热点,但较之先行开展区域研究的国家,中国近代区域经济史研究还处于起始阶段,只有少数几篇能够结合区域内的研究和区域间的研究。我的这篇论文,则被该报告首先予以重点介绍。

谢:我在责编“上海文化研究”专栏时,注意到在您的成果中有关上海的研究占了相当的比重,似乎您对这方面研究也情之所钟。

戴:是的。我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就是《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转移》。有关上海的研究,一直是我的用力所在。上海自1843年开埠后,迅速崛起,成为执中国经济牛耳的都市,百余年来雄踞龙头地位。其历史底蕴,无疑大可研究。关于上海城市史的研究,张仲礼、丁日初、熊月之等著名学者已有很多论述,成果斐然。相对而言,上海作为中国最大的港口城市,在发展进程中,与其广袤的经济腹地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明显薄弱,我的主攻方向因此确定。其后的一系列专题论文,得到学术界的好评。其中发表在《近代史研究》上的《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着力挖掘原始资料,包括各类已刊未刊档案文献、书报文稿,特别是那些已刊未刊海关资料、外国在华领事商务报告、中外人士实地勘察记录,以及各省、府、州、县地方志等,依据这些丰厚扎实的资料,对以往很少被论及的长江流域商路变迁问题,作了细致的考订和梳理,指出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物质基础,是长江流域各地为上海港内外贸易所提供的丰富的物资来源和广大的销售市场。两者通常又是重合的,往往在向外输出商品的同时,也成为接纳外来产品的销售地。将这些商品产销地与上海连接起来的,则是众多纵横其间的货物运输线路,沿线经济生活因此也呈活跃。不将其考订、梳理清楚,很多问题得不到科学的说明。

谢:看来您的这项研究有填补空白之功,不知学术界评价如何?

戴:正如您所说,对这项填补空白的研究,学术界表示赞许,认为

大变局下的民生——

上海如何带动长江流域经济的发展,过去大多是泛泛而谈,我的研究则根据翔实资料,通过对近代上海与宁波、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重庆各口岸之间商品流通环节的论述,突出了上海在诸口岸中的中心集散港的地位,同时清晰地揭示了上海港与不同层次腹地间的关系,有力地论证了上海从长江三角洲区域经济中心发展为长江流域龙头城市的历史进程。这项研究曾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论文奖。

谢:我觉得您的成果有双重效应,即不但有学术价值,也有现实作用。当前利用外资发展经济是个热门的重要课题,历史上不乏这方面的经验和教训。我发现在您的学术研究中,似乎也有所涉及,能否作些介绍?

戴:可以。我在考察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的互动关系时,注意并研究了外资和侨资企业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以上海为例,来自美国的投资就引人注目。上海是中国沿海南北货运理想的交会点,又背倚长江流域广袤的经济腹地,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这些独特的优势早就引起美国人的注目。以往人们大多强调英国人对上海开埠的推动,但据近年披露的档案资料,早在此前美国人已经驾船径抵上海,提出了通商的要求。自开埠后,美国人在沪投资的领域逐渐从商贸交易扩大至工业、航运等部门。这些投资为美国企业家带来丰厚的利润,也是近代美国在沪企业投资持续发展的要因所在。但也应该看到,在其赢利的同时,也由于其代表着先进的生产力以及所拥有的近代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方式,对当时还很落后的中国起了示范和推动的客观作用,有助于中国社会的近代化进程。上海第一家船舶修造厂和轮船公司都是由美商创办的。这对作为港口城市和以港兴市的上海来说,其意义是突出的。以上海为重点的这些企业投资,对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演进,作用也是明显的。诸如美孚石油制品及肥皂、卷烟、火柴等输入,推动了中国城乡社会生活的变革。

在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进程中,侨资企业的作用也不可忽视。华侨华人回国投资兴办近代企业,是和20世纪初中国社会经济、政治的一些显著变化和特点紧密相联的,包括国内资本主义发展的推动,收回利权等爱国运动的促进,以及清末新政期间招徕海外侨资等措施的推

行等。由于身处海外资本主义世界,对近代经济、科技和文化,华侨华人有较多了解,通过他们的中介或投资,陆续引入中国,在许多领域都是开风气之先,直接推动了城乡经济的发展。我认为,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应加强这方面的研究。我的上述成果,已经得到人们的重视。

谢:据我了解,您的博士学位论文学界很是赞赏,并获得了全国大奖。这很了不起,因为这可以理解为在“强将”(博士)之中的夺魁,值得祝贺。

戴:谢谢您的夸奖。在前不久结束的第二届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评选中,我的《港口·城市·腹地——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历史考察(1843—1913)》荣列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之一,这是复旦大学、同时也是上海市各高校和科研机构人文社会科学类迄今第一篇博士论文奖,是对我的很大鼓励。这篇论文是在邹逸麟先生指导下完成的,它集中反映了我对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经济关系的思考和探究。论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将港口与所在城市及经济腹地作为一个整体进行了多方位的考察,深入探讨了上海依托港口发展成为近代中国经济中心城市的进程和特点,论述了上海中心城市地位的确立对长江三角洲及长江流域经济格局、市场网络、城镇体系和习俗风尚等社会生活诸多方面带来的深刻变动,论证了上海以内外贸易为纽带,与周边地区及内陆省份之间互补互动的双向经济关系,并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角度,对上海港和上海城市今后的发展,以及进一步加强上海与内地的经济联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这项研究被认为选题独到,从总结区域经济发展历程着眼,将港口与所在城市以及经济腹地作为一个整体综合考察,以港口为研究的切入点,详尽阐述其中紧密的经济关系,视野开阔,剖析精当,立论坚实,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兼具,是一项开拓性的研究。论文完成后,即获上海市马克思主义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这次又获全国奖项,我深受鼓舞。

谢:多年来“青春作赋,皓首穷经”般地苦学深研,您一定有很多心得,能否介绍一些学术感悟?

戴:与前辈学者相比,我的治学还刚刚起步,还谈不上有什么学术感悟,但可以谈一些体会。我觉得,从事学术研究切忌浮躁,应认准目

大变局下的民生——

标,持之以恒。如果说我在中国近代史的突破口——经济史研究中还有些成绩,并得到学术界的肯定,主要是这些年来我始终没有懈怠,坚持从挖掘原始资料着手,拒绝无根据的臆断,并贯彻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原则,独立思考,敢于攻坚。同时,应尽可能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重视学习和借鉴相关学科的知识和方法。因为现代科学的发展,同样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想取得创造性的成果,必须重视各学科知识的融会贯通。尽管工作繁忙,我仍决定在职攻读历史地理专业的博士学位,正是为了给自己加压,促使自己去学习更多的知识,事实也说明我的选择是对的。博士学位论文正是综合运用了经济学、地理学、历史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专业知识和方法,才有可能提出一些有创见的论点。此外,我认为置身当今如火如荼的改革开放年代,作为一名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应该关注现实,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回答现实生活提出的一些问题。事实上,严谨的学术研究成果,是能够为当代的社会发展提供帮助的。即使是历史学这样的基础学科,也同样可以是有所作为的。2000年3月,我曾应邀参加由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共同主办的“21世纪初长江三角洲区域发展战略研讨会”,依据自己的长期研究,提出在规划未来发展战略时,应淡化行政区划的因素,应着眼于整个区域经济联动发展的总体设计,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化。我指出,1843年上海开埠前,与长江流域及长江三角洲地区的经济关系发展迟缓,人为的政策如广州一口通商禁令阻碍了客观经济规律的运作。自开埠后,这种束缚被打破,经济规律的作用得以显露。中国对外贸易重心由广州向上海的转移,应是鲜明的例证。而西方列强在华势力的扩张,中国封建政府的衰弱,虽是一种特定的历史现象,却又使得上海在其发展进程中,很少受到先前那种人为限制或政区束缚,较多的是客观经济规律在发生着作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和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的联动,当是这种作用的产物。近代以来,长江三角洲地区一直是与上海联结最直接、关系最紧密的经济腹地,也是全国经济发展最快、城市化程度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区,又是外国投资最多的区域。以上海开埠为契机,这一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联动的趋势。以城镇格局言,它促使了

区域经济中心由苏州向上海的转移,并相应导致原先以苏州为中心,由京杭大运河为纽带的城镇体系转而归向上海。这些城镇的商品流通结构,也由先前面向国内市场并以粮棉产品交换为主,逐步转化为纳入国际市场的以外国机制工业品与中国农副产品间的交换为主;并使一部分以个体小生产者之间交换日用必需品或家庭手工业所需原料为基本特征的农村集镇的商业活动趋于衰败,代之而起的则是一批适应进出口贸易增长及城市发展需要的新兴市镇,并推动了这些城镇经济结构的演化,是日后无锡、常州、镇江等与上海相呼应的苏南近代城市链兴起的先声。现在中国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规划未来发展蓝图时,仍不应忽视历史给我们的启示。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已有一些教训可吸取,如港口的重复建设,过度竞争,应该引起我们的重视。

谢:再过几天,21世纪即将来临。在当前和今后的学术生涯中,您有什么研究打算和研究课题?

戴:目前我正在撰写一部专著《近代中国城乡经济的互动》,旨在充实和扩展原有的学术研究,从理论上阐明中国传统城乡关系在近代所呈现的新的历史形态及其发展趋向,澄清以往在左的观念影响下一些似是而非的论断,在实践上为建构和完善新的城乡经济关系,推动城乡经济的全面发展,提供自己的一些见解。我所在的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最近组建了“中外现代化进程研究中心”,中国近现代史专业是校重点学科,科研力量雄厚,学术梯队齐整,依托这种群体优势,由我主持的科研项目“近代中国东西部经济发展进程比较研究”已经展开,先期的研究成果如《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已经发表。

现实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联系。中国地域辽阔,在自然、地理、人文和历史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区域差异和发展不平衡客观存在,其中尤以东西部之间的差异更为突出,这直接制约了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共中央已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项研究对近代中国东西部之间的经济联系、社会发展程度差异及其成因,从自然、地理、人文因素等方面,作具体细致的考察,以期从历史的角度,揭示东西部发展不平衡的多重因素,为尽快缩小东西部之间的发展差异,有针对性地实施支援和建设方案,提供历史的借鉴。其中包括研究自然、地理条

件与东西部发展的关系,这是以往研究中较少涉及的问题。自然、地理条件,是社会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经常的和必要的条件之一,它能促进或延缓社会生产发展,并影响产业的布局。从农业、工业、交通运输业等角度考察,东西部在气候、地质、地貌、水文等方面各有特点,相对而言,西部所受的制约更大。在科技水平低下的近代中国,这种制约尤为明显。粗放型的农牧业和交通闭塞,影响自然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开发,阻碍西部经济的发展,与东部的差距拉大。这都需要条分缕析地研究探讨。此外,还要研究社会环境与东西部发展的关系。在近代中国,东部地区较早受到外国资本主义入侵的影响,旧的社会结构较早受到冲击和趋于分解,在社会为之付出沉重代价的同时,也为新的发展和进步提供了条件,这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习俗和阶级关系等方面,都有具体表现;而西部则相对滞后,旧的社会结构和封建传统较少受到冲击,阻碍了新的社会进步因素的输入和传播,削弱了东西部发展的联动效应。研究其中的诸多问题,是很有必要的。我将一如既往,潜心钻研,踏实前行。

(原载《学术月刊》2000年第12期)

目 录

代前言：历史学研究视野的拓展 I

第一编 新旧经济因素的调适 1

- 中国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再考察 3
- 中国近代工业地理分布、变化及其影响 12
- 中国近代工业与城乡人口流动 32
- 抗战时期中国西部工业的转机和困顿 45
- 1949年前后上海民族工业的绝境与转机 67
- 朝鲜工匠天津机器局学艺考述 81
- 近代中国美商的广告宣传 87

第二编 新的贸易和交通格局 95

- 五口通商后中国外贸重心的转移 97
- 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商路变迁 108
- 近代上海与长江流域市场网络的架构 123
- 近代上海国内沿海埠际贸易探析 134
- 口岸城市与周边地区近代交通邮电业的架构 143
- 上海地区内河航运的历史变迁 158